

商人、仆人、通事和十八世纪中国沿海洋泾浜语的形成

司 佳

摘 要

这是一篇研究洋泾浜语的历史学文章，而非语言学论文。语言学界对历史上的中国沿海洋泾浜语已作了细致的内部语言剖析工作，但对其形成过程中的外部社会动因分析却未充分涉及。作为一种贸易通用语，其使用者的成分和背景对这种语言形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关键的决定作用。通过分析十八世纪澳门、广东沿海的“商人”、“仆人”、“通事”等直接参与贸易的“说话者”在早期洋泾浜语形成过程中的活动和表现，以及这个语言群体的来源和成分的变化，因缺乏直接史料记载的有关十八世纪中国沿海洋泾浜语的源起问题将会变得更为清晰一些。

[关键词] 洋泾浜语 贸易通用语 语言群体 语言接触

从语言学角度而言，洋泾浜语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语言在接触初期相互混合而形成的一种破碎的语言形态。然而因为这种特殊的语言形态总是在一定的“接触”背景下发生，因此，发掘洋泾浜语在其“语言”的形成历史中所起的社会作用乃“语言接触”过程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就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中国广东沿海流行的洋泾浜语¹而言，其所扮演的“贸易通用语”之角色在近代中西交流中的地位不容小视。它的特殊性来源于与之相关的历史环境：首先是这种混合语的起源及流行地域——先是澳门，再是广东，如同世界上大多数洋泾浜语发生在贸易接触的沿海线一带，澳门和广东沿海乃中外商人频繁活动，即而形成不同的语言接触、融合的一个场所。再者乃这一系列“接触”发生的时间：从十六世纪起葡萄牙人东来到十九世纪初鸦片贸易的尖峰，在诸多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要素中，语言的接触过程一直贯穿在近代中西交流的实际过程中。

国际上对十九世纪中国洋泾浜英语的研究比较充分。就已有成果而言，美国和欧洲的学

¹ 这里的洋泾浜语（Pidgin）指的是十八至十九世纪中流行于澳门及广东沿海的一种贸易通用语的学名。关于 Pidgin 一词的由来，学界尚未有定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个学名出现之前，用于描写这种语言形式的专名有“混合语”（compound language）、“破碎英语”（broken English）和“广东英语”（Canton-English）等。因其各阶段的语言特点不一，早期形态中还掺杂了澳门葡语混合语的成分，不能严格说是“洋泾浜英语”，故本文用“中国沿海洋泾浜语”作为一个统称。

者各有专题研究论文发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已故语言学教授瑞内克(John E. Reneicke)所作的先驱性开创工作。在其1937年答辩通过的耶鲁大学博士论文《边缘语言:混合语和贸易行话的社会性调查》²中,瑞内克先生以一章的篇幅先是对中国洋泾浜英语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作了一个勾画,继而对其语言形式作了专门研究。1944年布朗大学的霍尔(Robert A. Hall)先生在《亚洲学会学报》上发表了《中国洋泾浜英语的文本和语法》³一文,在瑞内克一文的基础上对中国洋泾浜英语的语法结构作了深入分析。而后,欧洲的语言学家亦在七、八十年代有若干篇论文和著作出版。⁴就近十年的研究情况来看,有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石定栩先生在《中国语言学报》上著文《中国洋泾浜英语:它的起源和语言学特征》⁵,使语言学上的分析更加细致、完整。

虽然世界上大多数的洋泾浜语都有一定的贸易接触背景,但就中国的沿海洋泾浜语而言,前面所讲到的发生地点与发生时间的特殊,使这个背景更为繁复,同时可资发掘的社会意义也更为宽厚,这恰恰是前人研究工作中没有深入的。因为提及“洋泾浜语”这一概念,大多数研究者将其直接看作一个语言学研究的实体,即寻找历史上的材料(对于已死去的洋泾浜语),或调查记录现今的材料(对于现在世界上仍在使用的某些洋泾浜语)对这一语言形式作出语言学归属的划定。对其形成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动因的分析,多依赖19世纪30年代美部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撰写的几篇有关“广东英语”(Canton-English)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澳门、广州等地的使用情况的文章⁶,这些文章多被认为是最早探讨中国沿海洋泾浜语的综合性文章。然而除此之外,一些间接性的材料却不能够充分发掘,如十八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初欧美人的航海旅行记,以及十九世纪中后期出现在欧美国家报纸杂志上的述评等。这些材料虽然零散,却十分丰富,有利于我们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一种伴随着文化接触而产生的语言接触现象,进而挖掘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构建这种语言形式在当时当地所支撑的社会图景。这里反复使用“社会意义”或者“社会性”、“社会”等词,不是在套用概念或者仅此提供一个研究视角,而正是要对一种特定的

² *Marginal Languages: A Sociological Survey of the Creole Languages and Trade Jargons*.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Graduate School of Yale University, 1937)

³ Robert A. Hall, *Chinese Pidgin English Grammar and Texts*. In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tudies*, vol. 64 (1944), pp. 95-113.

⁴ 比如,英国牛津大学的菲力浦·贝克(Philip Baker)于1987年发表的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Pidgin English and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ous Pidgin Englishes of the Pacific Region*. In *Journal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 vol. 2 (1987) pp.163-207. 此外,还有德国学者 Bauer 的著作 *Das Kanton-Englisch*, Bern, Frankfurt: Lang, 1975.

⁵ Dingxu Shi, *Chinese Pidgin English: Its origin and linguistic features*. 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19, no.1 (Jan 1991), pp. 1-42.

⁶ Samuel W. Williams,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I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6 (1836), pp. 276-279.

语言形式所在的社会环境作出实际的分析。尤其是对那些直接参与这种“接触”活动的人,自十七世纪中至十九世纪中在广东沿海参与洋行交易的商人、通事及仆人等,剖析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和在这种特定语言形式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 关于中国沿海洋泾浜语形成的已有观点

马士(Hosea B. Morse)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讲到,“自大约1715年起,中国商人本身学会了一种古怪的称为‘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的混合语(patois),自后这种混合语便成为对华贸易的通用语。”⁷故瑞内克、霍尔等学者多以此为中国的洋泾浜英语的起源时间。但大多数学者因无法找到同一时期的相关史料为佐证,又多引以下1748年和1762年出版的两部航海旅行记中的记录作为发端的实证。

美国人乔治·安森(George Anson)在他1741-44年环游世界的航海记录中说:“我们欠考虑选择了在广州开展大量的贸易活动,有时靠一些中国人已经学会了的破碎英语(broken English)这种可笑的行话,有时靠一些其它地方的可疑的舌人们的口译。”⁸另一位美国人查尔斯·诺伯(Charles F. Noble)在1747-48年去印度的航行途中路经广东,据他的记载,当地的中国人普遍用一种“欧洲语言的混合物”(a mixture of European language)和洋人打交道,大多数时候是“英语和葡萄牙语,掺上一些他们自己的话。”⁹

对于具体这种语言形式为什么产生,综合一些国外学者的已有观点,大致为如下几种:

1) 关于语言和文化差异

霍尔在1966年出版的《洋泾浜与克里奥语》¹⁰一书中谈及中国的沿海洋泾浜语时,讲到当英国人于1664年在广州建立第一个贸易商行(factory)后,各种洋泾浜英语随即产生。当时的社会情形是,英国人视汉语为“未开化”之不可及的语言(“heathen Chinese”),遂为与中国人交流将自己的英语洋泾浜化(pidginize);同时,中国人视英国人如一切“番鬼”(“foreign devils”),鄙夷不屑而不愿屈尊学习这种夷语的完整形式。于是,这种不完善的语言形式便巧妙地符合了双方的皆欲咫尺之间把握对方的目的。

2) 关于语言和社会距离

保罗·斯多乐(Paul Stoller)在1979年Ian Hancock编辑出版的《克里奥语读物》¹¹中发

⁷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vol. 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p.66.

⁸ George Anson,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MDCCXL, I, II, III, IV*.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361.

⁹ Charles F. Noble, *A Voyage to the East Indies in 1747 and 1748*. London: T. Becket & P. A. Dehondt, 1762, p.262.

¹⁰ Robert A. Hall,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6. p.8.

¹¹ Paul Stoller,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abilized Pidgins*. In Ian Hancock (ed.)

表文章,认为洋泾浜语的形成与各地的本土文化观及因此而产生的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有关。拿中国沿海洋泾浜语来讲,在十八世纪中欧接触的初期,固有的空间观和哲学思维使中国人认定欧洲人是异教者,文化适应策略未能开花结果,反之两者之间形成了严格的社会距离。于是中国人以学习洋泾浜语为保持与欧洲人之间的距离,而欧洲人用洋泾浜语作为一种与远离文明的人交流的工具,以取得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相似的“种族优越感”(ethnocentric)使洋泾浜这种语言形式成为两种文化在交流、互动过程中形成一种“对称模式”的表征。

3) 关于语言和商业利益

赫尔姆(John A. Holm)在1988年出版的《洋泾浜和克里奥语》一书中以一节的篇幅介绍了中国洋泾浜英语。他认为当时英国商人的活动之所以受到限制,之所以没有中国人可以教他们汉语,是因为显然在贸易活动过程中,洋人就无法听懂中国人之间的谈话。这样他们只能被迫依赖通常从澳门来的通事作为中间转译人,他们讲的洋泾浜语更像葡萄牙语。这种洋泾浜语最终便在至广州贸易的英国和其他外国商人、随行水手及中国行商中间流行开来。

因为现在能看到的直接记载关于18世纪初中国沿海洋泾浜语的材料不多,对于其早期的形成过程,众解释仍然显得含糊。前两种观点的作者都没有直接阐述在什么情况下由谁先确立这种语言形式;同时,两者的内在逻辑却又都符合欧洲人将自己的语言“洋泾浜化”在先,中国人学习这种已“洋泾浜化”的语言形式在后。这又似与众多学者认定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的材料不符。另外,在谈及中国方面时,霍尔与斯多乐都只注意到了一般意义上讲近代中西交流的“中”,即当时社会的主流群体,而忽略了直接参与沿海贸易的底层民众。或者说,没有把这两者区别对待。这才导致说“洋泾浜”这种破碎的语言形态是因文化抵触和自我中心而起。

赫尔姆的观点的材料虽多出于瑞内克的博士论文中所引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材料,但其见解直接接触了当时洋泾浜语流行的一个社会背景——商业贸易和经济利益,这是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洋人与中国行商们在广东沿海接触活动的主旨,而非其他比如传教士团体实行的“文化适应”策略所追求的目的。赫尔姆在讲洋泾浜英语之前还介绍了以葡萄牙语为底版的克里奥混合语及其在澳门的发展形态,这对研究十八世纪初中国沿海洋泾浜语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因为在现能看到的最早记述这种语言形式的直接材料,即前面讲到的乔治·安森和查尔斯·诺伯的旅行记中的一些记录皆是葡语洋泾浜和破碎英语的混合物。然而葡语洋泾浜的成分在十九世纪初的文本记录中便荡然无存了。这不仅说明早期中国沿海洋泾浜语不能等同叫做“洋泾浜英语”,还暗示了自十八世纪初至十九世纪初英语,即使是破碎英语,对早期沿海洋泾浜语中的葡语成分有一个冲刷过程。可惜赫尔姆未能展开阐明“最终在至广州贸易的英国和其他外国商人、随行水手及中国行商”中间流行的洋泾浜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语言形式,与早期澳门通事所讲的洋泾浜语的关系,以及如何形成之过程等。

二 澳门的通事、葡语洋泾浜与十八世纪中国沿海洋泾浜语的关系

虽然 1637 年英国“伦敦号”商船第一次成功对华贸易，但是依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的记录，至十八世纪初的近一个世纪里，担任贸易翻译的多是葡语通事。因为十六世纪起至十七世纪，葡萄牙语是澳门一带的贸易通用语。“对华贸易船只上的英国大班，首要比备的是葡萄牙语知识。1517 年以后的一个多世纪，去中国的船只都是葡萄牙人的，而他们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沿海贸易的通用语。”¹² 因而，“最初于 1637 年来的英国人，除了依靠懂得葡语和中文的通事作为交流中介以外而别无他法。这种通事有时是个会说葡语但不可靠的中国人，有时是个地位低下能讲汉语的葡萄牙人；更普遍的则是一种混血儿，从父亲那里学会一种话，从母亲那里学会另一种话。”¹³ 由于历来在中国“通事”，尤其是民间通事，因为出身普通而水平一般，却又靠此双语技能为活，故时常被认为翻译质量不甚保险，另有误译欺诈、从中谋私利的可能。因而，这里就这种“不可靠的中国人”而言，“不可靠”的因素一可以是人品，二可以是因为语言能力的关系而不能依赖，这里则主要以后一种情况为出发点。

十七世纪的葡语通事讲的大可能是葡语混合语，而非葡语的洋泾浜¹⁴，因为他们的语言接受环境已经主要来自于家庭的混血背景。葡萄牙在十五、十六世纪世界航海贸易的过程中将其语言散布到她的航线上，比如西非、南洋一带的沿海，即而形成这些地方的贸易洋泾浜和葡语混合语。葡萄牙人于 1557 年抵达广东沿海后，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人起初可能只是用辅助性的手势与当地人开展交流。然而由于在此之前，葡萄牙人已在西非和南洋有使用贸易洋泾浜的经验，有学者认为极可能是这些葡萄牙商人因为贸易便利的需要，首先将自己的语言简单化，成为同当地人的一种粗浅交流途径。¹⁵ 这种观点的证据是当时南洋一带的葡语洋泾浜中混杂的非洲葡语混合语的一些词汇以及若干阿拉伯语的例子，因为葡萄牙人到达西非沿海更早，并且携带了一些有贸易经验的阿拉伯商人作为通事。而后，马来语又影响了这种葡语洋泾浜，因为最初至澳门的葡萄牙人的通婚对象通常是南洋一带的马来亚(Malaca)人，后来才是中国人。¹⁶ 由此，十六世纪时在澳门地区便形成一种以葡萄牙语成分为主，夹杂马来语的葡语洋泾浜。至十七世纪以后因语言群体的逐渐扩大，进而确立了其混合语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在后来的

¹² Morse, *Chronicles*, vol.I, p.66.

¹³ *Ibid*, p.67.

¹⁴ 语言学上认为某种克里奥(creole)混合语的祖先便是这种语言的洋泾浜(pidgin)形式。也就是说，当一种语言的洋泾浜形式在一地点逐渐稳固发展，进而形成一个特定的语言群体将其作为一种日常使用语，便可以认其为一种新的克里奥混合语；而相对来讲，洋泾浜语没有所谓的“独立性”，不是一种新生的语言。

¹⁵ R. B. Le Page and A. Tabouret-Keller, *Acts of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5-20.

¹⁶ G. Nogueira Batalha, *Lingua de Macau: o que foi e o que e*. Macao: Centro de Informacao e Turismo, 1974.

中国沿海洋泾浜语，甚至是十九世纪的洋泾浜英语中还有极个别的语汇既 not 来自英语，也与葡语无关，却着实是马来语及印地语。

这种葡语混合语与十八世纪出现的洋泾浜英语的关系可以从洋泾浜语使用群体的扩大以及洋泾浜语本身的语言成分变化两方面来考究。前面马士的材料已经提及，当英国人初至广东沿海贸易时依靠的主要是葡语通事，而这种通事多为有家庭混血背景的普通人。十七世纪时，除了这种民间“混血”的通事人员以外，也有当时在澳门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担当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翻译，以拉丁文为书面中介，东印度公司则以提供他们去欧洲的海洋交通之便为偿。¹⁷

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在广州出现了与“十三洋行”相应的一些外国商馆，为至广州的洋商向当地的行商租赁居住、储物、贸易之用。这样，洋商在广州便有了周期性的停留，“洋泾浜语”作为贸易使用语言便随之扩散到广州附近。尤其因1759年的“洪任辉 (James Flint) 事件”而直接导致洋商在广州的贸易受到一定的限制以后，他们的活动必须更多地依靠当地的贸易合伙人，“洋泾浜语”的使用者也就不再局限于澳门的“混血儿”通事及神职人员了。通常，在非贸易季节（大约每年的二月至九月），洋商洋货须退居澳门，至早秋十月才能在引水员、通事、买办的带领下进入广州。另有十八世纪中至十九世纪初时，一些英、美私人商船于进入广州城贸易之前，先需在沿海的小岛上停留一段时日，以领取一种称作“chop”¹⁸的官方通行证件。而在这些私商及随同人员的停留期间，他们还需要同当地的一些说洋泾浜语的通事、买办人员接触，有时还要用送礼的办法以期这些人与官方的联系早日取得“chop”，这在乔治·安森和诺伯的航海旅行记录中都可以见到。另有在《番鬼在中国》¹⁹一书中，作者 Downing 详述了在进入广州之前，在零丁的周围的引水员 (pilot) 给他提供的必要帮助。据他的记载，这种引水员一般是海岛上的居民，有的来自蛋家，熟悉水性和环境，能用破碎的洋泾浜语与洋商打交道，并有着行业的家庭传承性。只有通过他们的引导，船只才能顺利靠岸。岸上旅店的仆役也是一些会说几句洋泾浜语的本地人，于是“整个你所体会到的方便程度，都取决于他们对你的理解。”²⁰在澳门，这种人好像能懂葡语和英语，但说得都很糟糕，“好似这三种都必须得用上的语言（葡语、英语、汉语），已在脑中混作一团，根本无法区分。于是他们就用这种绝美的混合语言，加上若干个拉长的元音音调来同你讲话，使之与他们自己的语言尽量接近。”²¹

查尔斯·诺伯在他的旅行记中记录了他所观察到的“欧洲语言的混合物”、“英语和葡萄牙

¹⁷ Morse, *Chronicles*, vol.I, p.67.

¹⁸ “chop”一词本身也是洋泾浜语中的一个重要词汇，有“标签”、“印章”、“票证”等意思，词源多可能是马来语。

¹⁹ C. Toogood Downing, *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7*. London: Henry Colburn, 1838.

²⁰ *Ibid*, vol. I, p.34.

²¹ *Ibid*, vol. I, p.35.

语, 掺上一些他们自己的话”的实例。“*Carei grandi bola? What size of a wh—e they wanted?*”²², “*He no cari China man’s Joss bap oter Joss.*”²³ 前一句是问要哪种尺寸的, 是不是要大的 (*grandi* 即葡语“大的”)。后一句说他不信中国人的神, 而是其他的神 (*Joss* 是葡语的“神”)。

与当时贸易有关的源于葡语的英语词汇, 在美国人亨特 (William C. Hunter) 在《广州“番鬼”录》²⁴ 一书中略有记述。如 *compradore* (康白度, 买办) 的 *compra-* 即是葡语“买”的意思; *mandarin* (曼达林, 官员) 的 *madar-* 便是葡语“命令”之意; *junk* (中国帆船) 则是起源于最初在中国东南沿海贸易的葡萄牙人对当地土语 *cheung* (船) 的读音。在 1798 年范宁 (Edmund Fanning) 的旅行记录中, 除了个别如 *Josh* (即 *Joss* “神”) 是葡语词汇以外, 当地的广东人讲的洋泾浜多是英语词汇。比如一个当地人在对范宁介绍庙里的神像时, 说: “*Oh, that be for to take care and guard Josh, and see no man hurt him.*”²⁵ 意思是, “那是被用来保护‘神’的, 便没有人会来伤害他。”而在十九世纪初以及再往后的文本记录中, 句中便几乎都是英语词汇, 只是句子结构十分不完整, 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语法, 或说套用了一些本地方言的语法。

三 洋行、商馆与买办、仆人等底层语言群体的作用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到, 在英商早年的对华贸易过程中, 虽有葡语通事及一些在澳门居住的神职人员相助, 但语言交流并不直接, 需通过葡萄牙语或拉丁语为中介。这种“语言空白”的状态在十七世纪末英商在广州建立商馆以后, 逐渐开始发生变化。1699 年, 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十三行中租赁了“夷馆”(factory), 为其在广东的贸易代理落脚点。其后, 至广州进行私人贸易的船商亦可效法。然而在准许人住“夷馆”的贸易季节期间, 商人们的活动仍然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 不准进入广州城城墙以内的地区, 在一定范围之内选择买办、仆人, 须在通事的陪同下至特定地点遛游等等。这就在英商和商馆内的买办、仆人等之间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语言环境。在这个语言环境中, 一方是在当时缺乏客观条件无法学到汉语的英国商人, 一方是操粤方言并具备一定零散的欧洲语言知识的下层民众, 于是那种早先在澳门流行的零散、破碎的贸易通用语 (*lingua franca*) 便继续成为贸易双方用以沟通的中介。所不同的是, 在这个语言环境中, 由于接触对象更多是英语使用者, 以英语词为基础的洋泾浜词汇便逐渐成为十八世纪起中国沿海贸易洋泾浜语主要成分, 由此形成所谓的“洋泾浜英语”。按成分来讲, 它仍然是一种贸易混合语 (*patois*)、一种破碎的语言 (*broken speech*), 并且因为接触的双方——英商和广东的通事、买办群体——都同时有着说各自母语的条件, 这种洋泾浜形式便不可能

²² Noble, *Voyage*, p.240.

²³ *Ibid*, p.244.

²⁴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td., 1911.

²⁵ Edmund Fanning, *Voyage 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Collins & Hannay, 1838, p.263.

继续发展成为克里奥尔混合语。

关于这种固定却相对封闭的语言环境,在东印度公司的史料和外国商人的游记中都有记录。东印度公司在1716年左右取得了可以“选择认为合适的通事(Linguist)、买办(Compradore)、和其他仆役(Servant),并任意支配他们”的权利。²⁶ 诺伯的航行记录中说,“我们的贸易过程几乎都由中国的苦力(cowlies)来操作,这些我们雇佣做杂事的人,大多能说一些英语,这在我们看来很是方便。”²⁷ 在范宁的贸易记录中则有对其在广州落脚的商馆的描述:“这家商馆有餐厅、客厅和储物间,还有供买办、仆役、厨师和苦力们居住的房间。待商馆选定、买办联系完之后,由一个说我们这种陌生人语言的仆人,陪伴我们的行程充当译员。”²⁸ 这些底层民众给予洋商开展贸易的辅助,不仅有语言性的,还有事务性的,因而在这个封闭的语言环境中,洋泾浜语成为贸易双方的说话人和话语内容的实际桥梁。并且因为这种环境和场所的相对稳定,即便是“破碎”的语言形式也有着内在的发展,使其后来趋于“成熟”,终因地域范围而得名“广东英语”。

具体来讲,买办、仆役、苦力等说话人的职责分工对这种语言形式的“内在发展”的影响程度不一。他们虽然都是辅助贸易的劳动力,但实际司职各有不同。这里讲的买办就是帮助洋商买日用品,用以安置其在商馆内的日常起居的劳力(不同于后来在上海活动的洋商中介),因而具备的外语知识大都局限于日常生活用语。因为每天的重复作业,这些人的语言水平也只停留在原有的“洋泾浜”程度,没有外界动力促使发展。仆役和苦力还有一些不同,虽然他们也懂得一点基本的日常生活用语以及货物的英语叫法。苦力着实为帮助洋商装卸货物、付出劳力的人,“洋泾浜语”不是这些人用以交流的必要工具。而仆役则以照料商馆内洋商的起居生活为主,不必干很多体力活,却要用实际的语言作为沟通的手段。因为与洋商接触的机会相对较多,“仆人”的职位还是一个重要的习说英语的途径。诺伯在他的旅行记中就曾提到,“有时,精明的中国商人会把他们的儿子送来作你的仆人,以便能被教授一些英语,即而他们便有资格和欧洲人进行贸易。”²⁹ 看来,“仆人”的活儿并不低人一等,反之是年轻学徒积累商业“资本”的一个必备过程,而“洋泾浜语”便是这些“资本”中的一部分。因为在当时的贸易情形下,双语能力无疑是能占贸易上风的一个优势,它明显与商业利润有关,致使广东当地的商人、仆人等都对学习和使用这种语言形式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是,因为这种“教”、“学”环境都是临时、不固定的,因而不可能发展为正式的语言学习。

在商馆之外,十三行贸易中的公行制度也是形成一个固定的洋泾浜语环境的重要因素。1720年,在广东的中国行商为了发展自身的利益,结合成为一个团体,成为中英贸易中的主要代理

²⁶ Morse, *Chronicles* vol. I. p.156.

²⁷ Noble, *Voyage*, p.224.

²⁸ Fanning,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263.

²⁹ Noble, *Voyage*, p.224.

中介。³⁰ 由于所谓的“皇商”，即清政府指派的官商毫无外语知识，而大多数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和一些欧美的私商也不懂中文，行商们的“代理”中介中便多了语言翻译这一项实乃非贸易的职责。一些主要行商的英语，即使也都停留在洋泾浜语形态，多比普通下属来得好。据诺伯的旅行记中的描述，庭官（*Tingua*）的英语是“众商人中最好的”，为人也“较为正直”。³¹ 另有一位担任公行团体中的“担保人”（*fiador* 或 *surety*）角色的主要行商，需具备较多的外语知识，因为主要的贸易流程都要由经他手。在行商之下，还有协助贸易的买办、通事、和出纳、书记员，按程度的不同多少懂一点洋泾浜英语。其中还是通事的英语能力最为重要。不同于先前在澳门或附近海岛上的“个体通事”，十三行贸易中的广东通事在沟通外商与河泊所政府官员两者信息往来中起着关键作用，同时亦参与所有的贸易过程。“除了担保人和买办之外，每艘贸易船只还必须要有一位通事，大约要花费一百二十银两。这种人尤为重要，因为他是被雇请来参与海关交易中的所有议程的。”³² 但是，由于出身背景及学习途径的因素，这些“翻译者”的语言能力十分有限，并直接导致这种洋泾浜语的实际交流功能亦有一定的限度。据《东印度公司编年史》的记载，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翻译公文往往还要由公司内极个别懂得中文的职员再次进行推敲。³³

结论：语言的社会性及其在历史中的位置

综上所述，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在澳门、广东的商人、通事、仆人等直接参与贸易的“底层语言群体”对沿海洋泾浜语的形成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语言的功用性来讲，洋泾浜语在当时的社会中乃“贸易通用语”的实质，因而必与使用者的成分、地位以及其在贸易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虽然这种语言形式的本身具“半中半西”的结构成分，然而这里的“中”和“西”并不直接等于宏观意义上“中西交流”的“中”和“西”。语言的外部社会功能与参与实践的说话人有关，与其用以交流的对象有关，因而便不可能跳跃式得上升到“中西交流”过程中的哲学思维模式或是文化适应策略等层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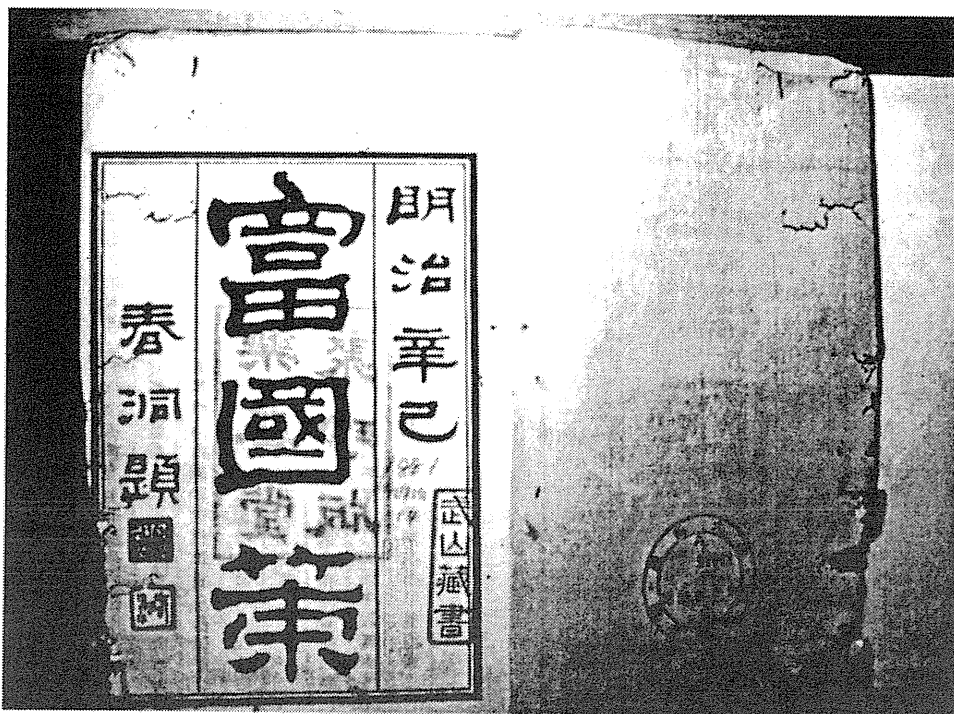
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十八世纪，在中国沿海形成的是“洋泾浜英语”（早期形式有澳门洋泾浜葡语的痕迹）而非“洋泾浜汉语”的深层原因。是因外来的商人无法学到汉语，还是因贸易经济利益，“屈就”自己的母语，将其“洋泾浜化”？如果再次将商人、通事、仆人等“语言群体”以及他们在这段语言的“历史”中所表现出的主动积极的一面考虑进去，或许能对这整个过程再添加一些历史的阐释。

³⁰ Morse, *Chronicles*, vol.I, p.163.

³¹ Noble, *Voyage*, p.254.

³² Josiah Quincy, *The Journal of Major Samuel Shaw*. Boston: WM. Crosby and H.P. Nichols, 1847, p.176.

³³ Morse, *Chronicles*, vol.III, p.36.



関西大学図書館増田涉文庫所蔵の漢訳洋書：『富国策』『公法会通』